

收稿日期:2022-03-12

浅析新四军领导人的统战艺术

刘维荣

(江苏省档案馆,江苏 南京 210008)

摘要: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新四军领导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创造性地开展统战工作,展现了高超的统战艺术。联络团结了各界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各阶层开明进步知名人士及社会名流,繁荣了解放区的文艺宣传活动,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敌斗志,弘扬了民族正气和爱国主义精神,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关键词:新四军;领导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2)03-0052-07

作者简介:刘维荣(1965—),男,江苏建湖人,江苏省档案馆研究馆员,硕士,主要从事红色文化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2.03.037

抗战时期,新四军始终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长期坚持持久抗战的路线,创造性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新四军战无不胜的重要保证,更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新四军领导人遵照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独立自主的方针,高举民族解放大旗,灵活地运用了“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团结一切可能抗日的力量,广泛依靠千百万抗日民众,长期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残酷斗争。

新四军领导人深知,执行中共中央的命令,求得生存和发展,既要发动和组织群众,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抗击日本侵略军,更要广泛开展与华中广大地域内的国民党桂系、川系、粤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并同当地的社会名流及开明士绅加强联络,强调停止内战与联合抗日的重要性,使他们对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更多的了解,从而扶助和发动各种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1938年5月下旬,新四军第一支队在南陵召开全支队干部会议,陈毅明确指出,只有取得广大人民的支持,只有树立人民战争思想,才能胜利地开展游击战争。要想获得全面抗战的胜利,就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拥护,是更好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基本条件。要想胜利地完成上述目标和任务,新四军就必须通过自身模范的纪律,向人民大众全面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决执行党中央制定的各项方针与政策,这样才能不断取得对敌伪顽斗争的彻底胜利。

一、在反顽斗争中彰显高超的统战策略

新四军领导人高度结合革命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以高超的策略思想和统战艺术,使新四军在严峻复杂的环境下与日伪顽开展的全方位斗争中,尽一切可能最广泛、深入地团结所有能够团结的力量,从而使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军事上彻底陷入了完全孤立的境地。新四军领导人军事上的正确部署和卓越指挥,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为华中抗战打开了崭新的局面,为敌后根据地的巩固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了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新四军领导人陈毅运用机智灵活的策略,足智多谋地利用国民党顽军各派系内部复杂而微妙的派系斗争,开创性地提出“击敌、联李、孤韩”的方针。黄桥决战的胜利,迎头痛击了顽固派,全面争取了中间势力,对全国抗战大局具有重要意义。

国民党顽固派急先锋、地方实力派韩德勤,当时担任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的要职,却一贯不思抗战,想方设法地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自诩拥兵 10 万,暗中勾结日伪,摧残抗日力量,成为苏北抗战的主要障碍。韩德勤组织优势兵力于 1940 年 9 月 30 日对黄桥地区的新四军发动进攻。陈毅分析苏北形势后认为,要削弱韩德勤的军事力量,最重要的是要争取国民党鲁苏皖边游击总指挥李明扬保持中立。陈毅不顾个人安危,先后三次进入情况复杂的泰州城,提出了“团结抗战、互助互让、共同发展”的主张,表明与李明扬友好合作抗日的愿望,在陈毅的积极争取下,李明扬答应在韩德勤进攻新四军时严守中立。陈毅灵活运用“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对“二李”(李明扬及副总指挥李长江)的统战工作取得重大突破。

陈毅及时总结黄桥战役的统战成就,于 1940 年 10 月 28 日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苏北统战工作的经过与主要经验》的报告。11 月 18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专门将这一有关统战工作成功尝试的报告转发给我党领导的军队系统深入学习。

二、团结爱国民主人士的统战政策

新四军领导人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特别强调这是打开敌后抗战局面的重要前提,要求各级干部注意调查研究社会情况,学会灵活运用策略,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遵照党的方针、政策,各部队大力开展统战联络工作。陈毅还亲自联络一些社会名流、开明士绅和民族资本家,深入了解他们的政治态度和基本利益所在,因势利导,积极推动他们参加抗战,携手共同抗日。

由于陈毅、黄克诚等新四军领导人亲自运筹并参加统战工作,在当地很有影响力的各界知名人士,如李明扬、朱履先、韩紫石、杨芷江、庞友兰、计雨亭等,均明确表态真诚拥护共产党抗战,他们还积极出面为新四军作宣传,为抗日救亡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由此,新四军打开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抗日根据地建设中的新格局。可以说,扩大并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核心就是对中间派别力量的大力团结与积极争取。

新四军党政军各级领导广泛开展了中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他们亲自拜访华中抗日民主政权的爱国中间势力和根据地内有一定声望的开明士绅,主动深入细致地解说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抗日方针,积极争取他们投身抗战。党政军各级领导更是以虚心真挚的言行对待并感化爱国民主人士,灵活采取多种方式如主动访谈、书信往来、诗文唱和等,增进彼此的熟悉与了解,尤其注意顾及他们的切身利益。在新四军各级指战员们身体力行的感召之下,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纷纷投身抗日斗争洪流,涌现了许多毁家纾难、舍身救国的感人事迹。

新四军坚持全民抗战,在军事上采取积极有效的战略,在纪律上实行秋毫无犯的严格要求,

在经济上采取劳资互利的适用政策,尽可能地团结和争取各地有声望、有威信的开明士绅(如苏中的韩紫石、朱履先)、社会名流(如苏北的宋泽夫、杨芷江)、民族资本家(如鄂豫边区的杨经曲、李德纯,皖江的吕惠生,浙东的吴山民)、国民党的旧官员(如苏南的樊玉琳、巫恒通,淮北的鲁雨亭、彭笑千、淮南的童汉章、梅子明),等等。著名的新闻工作者、爱国民主人士、救国会领袖邹韬奋于此感慨良多:“新四军与士绅朋友密切配合,能于生死之际互相信托,于敌伪高压之下毫无背离,此乃中共统一战线政策之伟大成功,绝非谎言,余不到敌后根据地,余亦不信能做到如此成功之地步。”^[1]

新四军对地方实力派也是采取团结争取的方针。张爱萍等在皖东北争取了盛子瑾,才有皖东北抗战局面的打开。彭雪枫充分利用东北军将领何柱国与国民党嫡系部队中央军之间的派系矛盾,利用当地驻军对国民政府的疑惧心理,便利了新四军的发展,“说明大敌当前团结御侮之必要,以及分裂内战足以招致亡国之危险,求得他们不参加反共战争,或他们为敷衍命令计而打假仗朝天放枪等”^[2]。这些得力措施与切实可行的方法手段,进一步联合了共同抗日的各种力量,将反共顽固派彻底孤立起来,极大地化解了新四军在日伪顽各种敌对势力的全方位夹击进攻之中的被动与压力。

1941年1月底,陈毅、刘少奇等领导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为了团结广大爱国人士,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盐城召开盐阜区文化名人和著名士绅座谈会。在会上,刘少奇、陈毅等领导人关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慷慨激昂的演讲,与会人士对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赞不绝口。开明士绅们深感这支清廉的部队和腐败的国民党军队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同年2月,在阜宁县第一届参议会上,庞友兰、杨芷江当选为参议会副参议长。从此,他们与共产党、新四军紧密合作,积极投身到伟大的抗日斗争。

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苏北区党委书记黄克诚在华中局的直接领导下,在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颁布了《保障人权法令》《边区施政纲要》。黄克诚实行抗日民主政策,广泛发动群众,切实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黄克诚十分重视争取开明士绅和地主,1942年10月2日,盐阜区参议会开幕,出席代表中有前清举人庞友兰、北洋军阀吴佩孚的秘书长杨芷江、知名人士计雨亭等,黄克诚被共同推选为第一任参议长。1945年2月,第二届盐阜区参议会召开,黄克诚亲自主持并致开幕词。计雨亭议员当场捐法币10万元支持抗日,还动员儿子带领10多个青年参加了新四军。

华中抗日根据地在政权建设中认真贯彻了“三三制”原则。在充分发动群众,适当调节各抗日阶层的政治利益,健全各级党组织和做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爱国民主人士积极参与“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运作。在构成政权领导成分的比例上充分地考虑最大限度的民主化,中共党员、进步爱国民主的左派人士、中间势力分别占有三分之一之份额。通过充分尊重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民主政权建设,尽一切可能把所有赞成抗日及拥护民主的爱国人士团结到同一条战线中来,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致抗日,并对汉奸和反动派实行民主专政。

在新四军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下,各级民主政权以“三三制”的形式纷纷建立和发展起来,这有利于在政权建设中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团结和争取社会各个不同阶层及党派的爱国民主人士开展抗日斗争,也更有利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同时,通过宣扬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浴血抗战、保家卫国的真实感人事迹,使社会各界大量摇摆观望的人士受到爱国与统战是密不可分的生动教育。统一战线工作在华中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产生了极为重要的社会影响。

1940年8月,淮海区及其所属各县参议会陆续建立。盐城、阜宁参议会于1941年1月相继建立。截至次年底,整个苏北抗日根据地都建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其下辖的盐阜区与淮海区

都先后在各县召开参议会，并相应建立了当地所属的各级“三三制”政权机构，吸收和团结最广泛的抗日力量，推行民主政治。

1940 年春，陈毅经镇江陆小波介绍，与韩国钧开始信件往来。陈毅要求韩国钧支持新四军抗日，韩国钧对陈毅的文韬武略甚为钦佩，对共产党的政策逐步了解。1940 年 7 月中旬，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不断以大军阻击新四军于江边，并挑唆李明扬、李长江进攻新四军。为一致抗日，韩国钧奔走于各派之间，多次给“二李”去信制止。李长江进攻郭村失败后，他当面责备“二李”进攻新四军之错误，并说明大敌当前，国家危亡，应以团结抗日为要义。

1942 年 1 月 23 日晚，被日寇囚禁的韩国钧在忧愤之中与世长辞。刘少奇、陈毅和苏北地方政府及地方名流士绅等发起召开追悼会，由于战争原因，延至 5 月 5 日下午在苏北阜宁县张庄举行。5 月 11 日《盐阜报》“追悼韩紫石先生特刊”上全文刊发代军长陈毅《记韩紫石先生》《悼韩紫翁》两篇文章，引起了强烈反响。5 月 28 日，延安《解放日报》以醒目的《抗敌不屈气节可风，新四军暨苏北各界追悼韩国钧先生》为标题，全文报道韩国钧追悼会详情，肯定他为苏北团结抗日所作的贡献。

射阳县参议长邹鲁山，出身地主家庭，有着强烈的爱国心，始终同我党我军站在一起，深得各界人士的拥护。在日本侵略军对盐阜地区“扫荡”的严峻形势下，中共中央华中局与新四军军部准备全部迁移到津浦路东淮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二师驻地盱眙县黄花塘。1942 年 12 月 25 日临行前，陈毅忍痛将自己刚 4 个多月的儿子托付给邹鲁山。为了不暴露目标，邹鲁山四处声称自己无子，领养了个男孩，并精心地找好乳母抚养。次年夏季，陈毅设法派人领回孩子。

1943 年春，在日伪军大“扫荡”中，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派人将师部的钞票、银元、金条等军饷运到海边杨庄，交给杨芷江保管。杨芷江欣然同意，并叫人妥为埋藏。大“扫荡”结束后，杨如数把军饷交还给新四军。不仅如此，他还毅然接受共产党、新四军的委托，把邹韬奋、鲁芒、贺绿汀等 20 多位随军干部和文艺界名人留在家中打埋伏，冒着生命危险与敌人周旋。

对于广大爱国民主人士，陈毅以极审慎的态度，晓以民族大义，进行耐心争取，劝其明辨大义，广泛地团结了各种社会力量，扩大了江南敌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新四军各部队普遍进行了民主选举教育，选出军队代表参加地方政府和参议会。要求这些代表在工作中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发扬民主作风，尊重非共产党人士，防止包办代替。华中各根据地政府和参议会的民主改造，更加广泛地团结了各阶层的抗日爱国人士，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三、建立国际统一战线

陈毅有着深远的国际视野及战略眼光，在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牢固树立起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光辉旗帜。他通过长期的革命实践及正反两方面的深刻教训早已充分认识到，作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重要一环的中国人民的抗战，一定会得到各国爱好和平人民的极大同情与无私帮助，由此必须及早做好关心并支持中国抗战的在华国际友人的统战工作，构建国际统一战线。

1941 年 5 月，在陈毅积极争取和邀请之下，美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员、《太平洋事务》驻远东特约记者汉斯·希伯奔赴新四军新军部所在地盐城采访，陈毅特意安排希伯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内的乡镇、村庄、驻军部队一线采访，先后与新四军各级官兵、社会各阶层人士等进行广泛接触与沟通交流。不久，希伯撰写了大量通讯报道，如《重访新四军占领区》等，运用鲜活生动的第一手素材，详实记录了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的事实，而非“游而不击”。希伯还撰写了书稿《中国团结

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讴歌了新四军和根据地人民坚持抗战的伟业，向世界真实地报道了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的感人事迹。

皖南事变后不久，奥地利著名医生罗生特接受陈毅的盛情邀请，专程从上海赶赴盐城，对新四军的医疗事业进行指导，新四军军部在盐城泰山庙为罗生特举行了欢迎大会。陈毅、刘少奇亲自接见罗生特。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报《江淮日报》连续刊发《国际友人罗生特访问记》《国际名医罗生特参加新四军工作》两篇报道，高度评价罗生特的国际主义精神。罗生特向陈毅建议，培养大批医务人才的最好办法是尽快创办卫生学校，从而解决新四军部队医护人员紧缺的问题。1941年6月，罗生特建议创办的新四军军部华中卫生学校在陈毅的亲自过问下宣告成立，第一期就招收学员162名。陈毅在战斗间隙，亲临卫生学校讲话。在华中抗日根据地期间，罗生特运用高超的医疗技术，一丝不苟地为伤员服务，他的无私奉献精神受到新四军各级指战员的一致赞誉，在陈毅等人的介绍下，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

四、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统一战线政权

新四军领导人制定并执行有利于抗日的各项政策，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力措施。在组建的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机构里，广泛地采取“三三制”的人员构成方式，最大限度地容纳并吸收了社会各阶层的党外进步分子、中间分子的代表人物，有利于统一战线组成阵容的扩大。

1940年10月下旬，刘少奇等人率中原局机关由皖东移驻苏北阜宁一带。在苏北新四军已确立优势的情况下，刘少奇要求苏北区党委和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在高度重视对华中根据地大力建设之同时，更应时刻关注社会各阶层的切身利益，用长远的眼光将广大的地方实力派及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团结到自己周围，尊重其中立态度。根据中共中央11月1日《关于建立和巩固华中根据地》的指示，刘少奇提出广泛团结抗日根据地各阶层人民通过召开参议会，民主选举联合的抗日民主政府，实行民主政治。同年11月7日在苏中海安，刘少奇、曾山与陈毅等共同研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问题。11月15日，在刘少奇、陈毅的指导下，苏北临时参政会在海安召开，刘少奇在闭幕时作关于抗日民主政权工作的报告，强调这次会议通过成立以韩国钧、黄逸峰为主的苏北临时参政会和以管文蔚为主的临时行政委员会，是各抗日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他阐述了《施政纲领》的主要精神，要抓紧抗日民主政权建设，进而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应采取参政会的形式，建立起得到社会各界认可的抗日政权，必须最大限度地争取并团结拥护抗日的国民党员，团结一切具有爱国正义感的中间人士，努力邀请这些人加入各级参政会，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

1941年5月30日，刘少奇主持华中局作出指导根据地关注民生工作的《关于组织根据地内人民大多数的意见》。该意见要求各根据地党组织与部队：“尽一切可能改善工农劳苦群众的生活……要使华中根据地成为民族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必须抓紧解决目前的有关民生问题，切实解除民众中若干迫切的疾苦，就能够使之成为目前我们充分调动民众抗日积极性与提高民众民族觉悟及阶级觉悟的重要中心一环。”^[3]

新四军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在中共中央华中局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为了更好地巩固华中敌后各根据地，巩固与加强中共在华中根据地的地位，就必须充分意识到其最中心的环节就是做好群众工作。华中各根据地的地方党组织和部队党组织协同，组织工农、青年、妇女、儿童、劳苦群众的大多数，以教育广大群众为中心工作，刘少奇、陈毅十分重视并坚定地贯彻中共中央团结一切力量联合抗战的方针与政策。

为了进一步贯彻实施1942年1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尽一

切可能地充分发动群众,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刘少奇再三强调,要讲深讲透“二五减租”的重要性,这样才能更充分地发动一切群众,进而依靠一切群众的策略,它是抗战期间重点解决广大农民生存问题的根本决策。在刘少奇亲自委派了盱眙、高邮、六合等县县长,在此基础上,先后成立了各级区、乡政府机构,切实地规定并实施了有关组织减租减息、惩治汉奸、建立农会、组建各级人民抗日自卫队等行之有效的方法步骤,还陆续颁发有关征收公粮等涉及财政与贸易等方面的法规。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宣传党的团结抗战主张,切实遵照“三三制”政权组成标准,充分吸纳抗战爱国的各类开明士绅和进步人士加入到各级抗日政权机关中。

在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内,新四军所有部队都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能够有效解决“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之间矛盾的措施,更好地兼顾了农民与地主的利益,确保最广大的农民阶级能够成为积极抗日的主体力量。社会各阶层人士真心拥护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新四军,以更大的热情投身抗战,支持新四军全力抗战。

五、建立抗日文化统一战线

新四军领导人抓住华中敌后抗战局面业已打开的有利时机,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大力建立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新四军通过大力开展新文化运动,提高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新四军执行抗日的文化教育政策,抵制一切殖民化的文化思想,把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增强了抗日力量,孤立了反共的顽固力量。

1941年4月16日,在刘少奇、陈毅的倡导下,苏北文化协会代表大会在盐城召开。刘少奇、陈毅到会并发表讲话,刘少奇作了题为《苏北文协任务》的演讲,对苏北文协提出了三项具体任务,即:保护文化教育事业中一切人员的利益;普遍深入地开展苏北新文化运动;团结和组织苏北全体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人员,使苏北文协成为苏北文化界全体的组织。他们的讲话对推动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江淮日报》专门出了苏北文代会特刊,对团结各阶层人民建设和巩固根据地都起了重要作用。

在刘少奇、陈毅的发起和主持下,先后在盐城创办了培养文艺工作者、普及抗战文化的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及鲁艺工作团,积极开展抗日文艺宣传活动和文化统一战线建设。

陈毅与爱国文化人士时常诗词唱和,《盐阜报》1942年多次刊发陈毅与开明士绅、民主爱国人士的唱和诗词,如《悼韩紫翁 闻韩紫翁陷敌不屈而死诗以赞之》(陈毅4月26日)、《和杨芷江先生步六韵》(陈毅6月11日)、《赠陈军长》(阿英7月23日)、《和陈毅同志(三首)》(杨芷江8月1日)、《颂陈军长》(阿英11月18日)、《送沈、张诸君赴延安》(陈毅11月18日)等,这些诗词起到了很好的文化统一战线的示范作用,引起了盐阜区文化士绅界的极大反响。

为了进一步扩大新四军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影响力,共同研究开展军队的文化出版工作,更好地以文艺形式反映军队的战斗生活,1942年9月,陈毅在阜宁卖饭曹设立“文化村”,将苏北的文化人集中起来。“文化村”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来到抗日根据地,参加新四军和根据地的文化建设。

1942年11月,在陈毅的倡议及黄克诚、张爱萍的支持下,湖海艺文社成立。著名作家阿英起草的社约明文规定,愿以艺文为抗战建国服务者,方得为本社社员。阿英、彭康、范长江、王阑西、白桃、薛暮桥、车载及开明耆绅杨芷江、计雨亭等纷纷入社。11月20日,陈毅为此专门撰写了祝贺长诗《湖海诗社开征引》。不久,由阿英主编的《新知识》刊物上,特地增辟“湖海诗文选”专栏,刊发了《大柳巷春游六绝》(陈毅)等诗词。

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杨芷江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参议会工作。他先后当选为阜宁县及阜东县两县参议会副参议长和盐阜区参议会行政委员会委

员。杨芷江名作有为宋公纪功碑、新四军盐阜区抗日阵亡纪念塔撰写的碑文等。杨芷江还作诗三首和陈毅的《梅岭三章》，诗作洋溢着对陈毅的无限敬佩，流露出对共产党和民主政权的无比热爱。

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争取和团结社会各界人士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好地发挥他们在抗战中的特殊作用，新四军领导人创造性地开展统战工作，展现了高超的统战艺术，在联络团结各界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各阶层开明进步知名人士及社会名流，繁荣解放区的文艺宣传，鼓舞根据地军民发扬抗敌斗志及民族正气和爱国主义精神，推动抗战胜利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新四军·文献(3)[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1027.
-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新四军·文献(1)[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193.
-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新四军·文献(2)[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274.

On the United Front Work Strategy of the Leaders of the New Fourth Army

LIU Wei-Rong

(Jiangsu Provincial Archive, Nanjing, Jiangsu, 210008, China)

Abstract: The united front is one of the three magic weapons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defeat the enemy in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Leaders of the New Fourth Army implemented the principles of unity and struggle and unity through struggle in the work of the united front with creativity, making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They have organized representatives of intellectuals, activists and elites of all walks of life. They have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publicity and arts in the liberated areas, enhanced troop morale, propagated national spirit and patriotism, and created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consolid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iberated areas.

Key words: New Fourth Army; leader;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责任编辑:朱根〕